

●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儒家传统与 现代市场经济

● 马涛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996)项目
上海市教委青年基金(1998)项目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

马 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马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3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ISBN 7-309-02480-x

I. 儒... II. 马... III. 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市场经济-研究 IV. 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368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86 21 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6 千

版次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儒家传统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下篇为儒家传统与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全书主要研究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它为我国目前所从事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一份可借鉴和利用的文化历史资源。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顾 问	蒋学模	张薰华	陈观烈
	洪文达	叶世昌	洪远朋
	尹伯成	苏东水	顾国祥

主 编 伍柏麟

副主编	华 民	张 军	刘子馨
	石 磊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磊	刘子馨	华 民
朱国宏	张 军	苏荣刚
芮明杰	张晖明	陆德明
周伟林	姜波克	袁志刚
徐惠平	黄亚钧	彭希哲
戴星翼		

序

马涛博士研究中国哲学史有年,已取得相当成就,并有专著出版,在同行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199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本来可以成为名牌大学的哲学教师,但他却希望改攻经济思想史。我本来不认识他,他为了改行来找我。经过几次交谈,知道他很有敬业精神,在学术研究上确有发展前途,而且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又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故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后经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同意,吸收他为经济学院的博士后,并由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他在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成果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

马涛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对研究课题的选题和论文的结构、观点等曾多次和我进行了讨论。因为学科的差别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在讨论中随时有分歧产生。但他很虚心,尽量采纳我的观点,我也对有些不同的观点持宽容的态度。总的来说,在他的成果中已经包容了我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提法,自然仍有许多是他自己的见解。我们是“和而不同”,并不强求统一。

写论文并不能单靠观点。写成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必须有丰厚的材料,这就需要进行潜心的探求,决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完成的。本书的史料非常充实,有不少史料我原来并不知道,因此在指导本课题时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做到了教学相长。本书又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只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知识的学者是写不出这样的专

著的。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对研究儒家思想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儒家思想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而且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自儒家思想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后,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治国思想和主张都归宗于儒家的大旗之下。所以根本不能笼统地说儒家思想对发展市场经济是否有利的问题,而只能说哪些儒家思想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哪些则不利。本书就是从这一原则出发,选择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全面讨论儒家思想的作用。从这一原则出发,说儒家思想有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应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儒家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还存在着另一层关系。有些儒家思想有维护旧制度的作用,阻碍着新制度的形成。但是当新制度终于取代旧制度而取得统治地位后,新制度仍然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为巩固和发展新制度服务。现代的所谓“儒商”就是儒家精神和企业经营的结合,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本书下篇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

作者在研究本课题时,发现了前人对马克斯·韦伯存在着一个误解。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观点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方产生,而并没有说在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地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仍然同儒家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用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批驳韦伯并不符合韦伯的原意。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书作者的这一发现体现了这种精神。

马涛博士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学者,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有分量的经济学著作。是为序。

叶世昌

2000年元旦后于复旦大学宿舍

目 录

导言	1
----	---

上篇 儒家传统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1 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	11
1.1 “惠而不费”的自由经济思想	11
1.2 “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	22
2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对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33
2.1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对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33
2.2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对宋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41
3 儒家伦理与古代商业伦理的形成	48
4 儒家的重商意识与古代儒商的特点	65
4.1 先秦儒家的重商意识	65
4.2 宋明时期儒家重商意识的兴起	74
4.3 明清时期儒商的特点	82

下篇 儒家传统与东亚现代市场经济

5 东亚崛起的“世纪之谜”	93
---------------	----

5.1	东亚经济的崛起·····	93
5.2	东亚崛起的“世纪之谜”·····	98
6	儒学与东亚民族精神·····	111
6.1	东亚地区与儒家思想的渊源联系·····	111
6.2	儒学对东亚民族精神的影响·····	124
7	儒家传统在东亚经济崛起中的作用·····	134
7.1	“官民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	134
7.2	家族主义的企业经营·····	145
7.3	自由主义与“藏富于民”的经济策略·····	152
7.4	“高产乃为善”的经营理念·····	160
7.5	教育先行的发展方针·····	163
7.6	勤俭聚财的资金积累途径·····	171
8	儒家人本论与东亚管理模式·····	176
8.1	“以人为本”与东亚现代管理·····	176
8.2	“和为贵”与东亚现代管理·····	184
8.3	内在控制与东亚现代管理·····	194
9	现代儒商论·····	206
9.1	现代儒商的界定·····	206
9.2	现代儒商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212
9.3	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6
10	“亚洲价值观”与东南亚金融风暴·····	234
10.1	亚洲价值观的重评浪潮·····	234
10.2	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	240
10.3	儒家传统与东亚经济的复兴·····	243
11	儒家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47
11.1	韦伯理论理解中的一个误区·····	248
11.2	儒家人文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 驱动力·····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63
后记·····	267

导 言

德国著名哲人卡尔·雅斯贝尔斯(1881—1969)指出,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从公元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间,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在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一些对人类精神影响甚巨的大思想家,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又是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佛陀,希腊的荷马,巴勒斯坦的先知,由此开始奠定了东西方文化的两大文明传统。^①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居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地位。这一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是人们一直关注并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自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本世纪初(公元 1916 年)发表了他的有关中国宗教和经济伦理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提出儒家文化中缺乏一种独特的宗教伦理作为现代化必要的启动力量的论点后,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奉为主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但到了 70 年代末期,随着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工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导致一些中外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解释东亚工业成功的现象,并对韦伯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但要真正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文化传统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理论光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

好,是解释不了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还必须有第四大支柱,即制度。有了制度安排,才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在讨论制度变迁时还曾指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文化传统属于非正式约束的范围,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历史来看,在正式约束(即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作为非正式约束的文化传统来维持的,即使在现代社会,文化传统在维持人们的关系上仍然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再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时,只有在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可以大大降低正式制度创新与变迁的成本。所以制度规范必需是植根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土壤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这些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奏效。因之,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则必须考虑这一文化传统的制约因素。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曾指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因素。^②

纵观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几种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的产物,从而也就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我们这里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经济行为、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很不相同的。如在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在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长期固定的关系。日本企业的经理与普通员工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较小,

对企业经理激励较多的是职务的提升而不是货币收入的增加,企业也不轻易解雇员工。政府干预经济的领域要比美国多得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通常也要严得多。日本大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与美国大企业也有很大的差别,日本人对企业和政府也远比美国人忠顺得多。而美国的企业与员工、个人与个人之间则较多的是短期的金钱关系,从而与日本的人际关系与企业管理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突出强调个人行为 and 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差别,我们将日本式的市场经济归入“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或“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一类,而将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称作“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的干预和管理方面,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因而也名副其实地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当然,我们又不能把这种分类绝对化。我们称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在日本式的市场经济中,个人和企业就没有作出独立自主的经济决策的自由。其实,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个人和企业都基本上是自由地作出有关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决策的,只不过是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这种自由相对地要大一些,自由的领域也要相对广泛些。反过来说,我们把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也决不意味着美国式的经济中就没有行政管理和国家干预。实际上,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同样有着大量的行政管理,国家对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干预,美国的大企业也在拼命提倡员工的“团队精神”,只不过这些行政管理、集体协调在美国的经济模式中范围要窄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程度上也要松得多。而这些特征在日本式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则要大得多、强得多,以至成了某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

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作用是相同的。我们很难说美国的汽车制造技术与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这些国家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在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下,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造成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还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观念,造成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下,政府当然会对市场经济施加不同的影响。如在日本这一对上级的忠顺支配着社会心理的国家中,自然会盛行由权威机构或个人在市场运动之外来协调集体的行为的做法。总之一句话,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是市场经济在其中运行的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

不同的文化环境之所以能造成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又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那种技术的基础上,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来降低协调费用的结果。

所有的现代市场经济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技术基础,那就是:如果只考虑纯粹技术的因素,那么产品的生产技术上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由于生产在技术上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如果能够以足够小的代价协调不同的个人的经济活动,使他们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分工或协作,就可以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以给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协调费用比较低的经济体制,就其本质上说,它是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来协调他们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中,协调不同个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只能是交换。但是,也可以靠权威的指令、人们相互之间的民主协调或官僚机构的行政管理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这些不同的协调方式与直接的交换哪一种协调费用最低,成了决定使用哪种方式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问题上,协调费用最低的协调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通过市场的直接交换通常不是协调费用最低的协调方式。就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协

调费用最低的协调方式也往往是不同的。如在个人独立性较大的文化环境中,相对较多的问题是通过直接的交换解决的。而在人们习惯于依赖上级的指示、对上级比较忠诚的文化环境中,许多问题就不是通过直接的交换,而是通过某个权威在市场之外进行协调来解决。这也就是造成美国与日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差别的主要因素。

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一国的文化特征,从而成了决定该国属于市场经济哪种类型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之所以能代表当代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是由近代英国的自由移民建立的。在最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岛国英国一直有着较强的个人主义倾向。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更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典范。美国社会和独立的美国政府最初正是由英国的移民们建立的。这些移民们到北美来追求个人的独立发展,占居和垦殖“无主的”荒地,独立并自由地经营个人所有的农场。他们不仅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带进了美国,而且将它发展到了极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英国的自由移民的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而在日本,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服从权威、忠实于上级和团队的历史文化传统。日本人在依靠市场之外的权威来协调集体行为的习惯中,就已清楚地显露出了他们的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每当一国面临在几种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时,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通过决定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总会迫使它选择最接近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那种方案。这也就造成了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它的市场经济类型之间内在的联系。^③

我们今天正在从事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这就必然面临着一个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但遗憾的是国内只有少数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如盛洪强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

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的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④樊纲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⑤汪丁丁是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⑥但这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仍然是初步的甚至是表面的概括,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并形成对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的最基本概括。笔者不同意那种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实现工业现代化障碍的那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但也不是一位历史观上的文化决定论者。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作为“非正式约束”的文化传统对经济变迁与制度变革的论述是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笔者还认为,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但作为“非正式约束”的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人们和政府的行为,对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文化传统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也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一下儒家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无积极的意义,将是一件十分需要并积极富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出于这一意图,我们将探讨一下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哪些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因素,以便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一份可供借鉴和利用的文化历史资源。

注释

① “要是历史有一个轴心的话,我们必须依靠经验在世俗的历史中来寻找,把它看成是

一种对所有的人都重要的情况,包括基督教徒在内。它必须给西方人、亚洲人以及一切人都带来信念……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期,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按:指印度吠陀经中的梵文论说集)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按:以上诸人皆为公元前 9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的希伯来或犹太预言家,或称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斯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见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② 参见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0 页、第 84 页。
- ③ 参见左大培、裴小革著:《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④ 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载《经济研究》1996 年第 1 期;《中国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⑤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0 期;《中华文化、理性化与经济发展》,载《中国经济学(199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⑥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载《经济研究》1995 年第 9 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